

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探析

李守义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006)

辛 迎 (中国书店出版社 北京 100052)

提要: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文博类期刊的历史并不太长,数量也不是很多。然而,文博类期刊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是近代文博研究成果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对国外先进博物馆学理论、考古学理论的引进和近代中国文博事业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系统梳理出近代文博类期刊的历史发展脉络,对研究整个近代文博事业发展史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 民国时期;文博;专业期刊;特点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救国”理念的引导下,新式知识分子以“启迪民智、普及科学、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创办了大量的学术期刊,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创办期刊的高峰,形成了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期刊热”。在这一时期文博类期刊^[1]开始陆续登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自国立历史博物馆1926年创办《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开始,陆续创刊的各类文博类期刊达20多种,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博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国民对考古文博知识的普遍需求。但由于日本侵华及国内战火不已,正在发展中的文博类期刊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受到了严重摧残。这一时期的文博类期刊也存在着出版刊期不稳的缺陷,有些创办仅一期便夭折,有些几易刊名、刊载内容有所偏移等。因此,探讨这一时期文博类期刊的办刊背景及其特点,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展史至关重要。

一、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

依据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基本走势图(图1),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 诞生与初兴(1926—1929年)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文博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至1929年,全国文博类机构有60余个。随着专门性文博机构的出现,旨在传播知识和学术交流的文博类专业期刊也相继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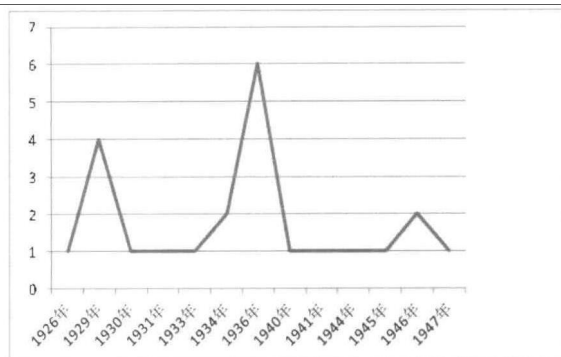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创刊时间统计表

1. 第一本文博类期刊——《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12年开始筹设,1926年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念职责之宏巨,思攻错于他山”^[2],于开放之日即出版了《国立历

[1] 本文探讨的文博类期刊,主要以刊载文物研究、考古研究和博物馆学的期刊为研究对象,兼涉部分报纸副刊。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博物学杂志》、《博物杂志》等期刊不在探讨范围之内。

[2]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第1年第1册,19辞,第1年第1册,1926年10月。

史博物馆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第一期,并于1927年出版丛刊2期。

《丛刊》第一期“发刊词”明确阐释了刊物的目的与任务。其目的是:“本刊之作,虽以报告馆务,说明藏品为归,而职志所存,亦拟藉兹舒布,庶嚶鸣之益,获教时贤”;其任务是:一曰保文物以存国性,二曰辑史料以供研究,三曰重实验以正虚诬,四曰整旧说以成学术^[1]。

《丛刊》全面反映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主要业务工作。刊载了《本馆馆址沿革考》、《本馆开馆记事》等,发表了馆藏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模制考工记车制记》、《馆藏周代彝器记》、《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太平天国玉玺考略》等。此外,还刊载了馆藏文物精品的图片,如内言卣、牺尊、巨鹿宋代故城桌椅、宋本《论衡》残卷、马绍愉致吴三桂书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等,供读者鉴赏。

《丛刊》还首次披露了一批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档案材料,以供学者研究。如《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内容包括崇德年间(1636-1643年)清与朝鲜往来文书70余件;《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所盗敦煌文献依类编纂;《盛京清宫藏品录》则介绍了教育部戴克让等人在盛京清宫调查的内府书画、瓷器、历代古器及清室奇珍异宝等藏品目录;《明清之际史料丛残》为192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清理内阁档案所获的明清史料;《辽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并跋》为1927年在内蒙古发现的辽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铭的拓本。

“除搜集古物外”,国立历史博物馆“特注意于发掘调查模制之三事,于以得前人未明之义,正先儒说解之失”^[2],陆续刊发了该馆人员的考古发掘报告。如《丛刊》第一期刊发了《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第二期刊发了《信阳汉冢发掘记》,分别记述了该馆人员1921年在河北巨鹿、

1924年在河南信阳考古发掘工作成果。并且还发表了有关考古学基础的论述,如连续三期翻译刊发了日本近代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考古学通论》,向文物考古爱好者介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此外,《丛刊》还专设《考古译丛》栏目,介绍国外考古最新发现及成果,让文物考古爱好者及时了解国外考古出土的新资料及其价值。

由于时局动荡、经费短缺,《丛刊》仅出版3期便停刊,但作为第一本国人自办的文博类期刊,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2. 文博类期刊的初步发展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开启了国内文博类期刊创办的先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各地博物馆与文博考古学术团体纷纷设立,其他文博类期刊也相继出现。这一时期的刊物主要有:

《故宫周刊》:创刊于1929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之际,至1936年4月出版到第510期,后因战争原因被迫停刊。1936年5月起,原《故宫周刊》改名为《故宫旬刊》,期数另起,至1937年3月因时局不稳而停刊。《故宫周刊》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历代帝王后妃像以及晋唐宋元时期的珍贵书画,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故宫周刊》曾出增刊六种,均为纪念双十节特刊。此外,这一时期故宫还编辑出版了《故宫月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等刊物。

《安阳发掘报告》: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专刊之一。对于创刊目的,李济在“发刊词”中写道:“有好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急于要知到(道)我们这次挖掘的经过及新出土的实物。因为挖掘没完,我们事实上不能作个完全的报告;因为我们又要继续挖掘去,时间上也不容许我们这时就作一篇完全的报告。因此我们决定部分的分期发表我们研究的结果;这种专刊就是为此而设。”^[3]由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陈寅恪、

[1]《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第1年第1册,1926年10月。

[2]同上。

[3]《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词,载《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12月。

董作宾等人任编辑。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共四册。安阳殷墟第1-7次发掘工作简报和相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

(二) 发展与兴盛(1930—1936年)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博事业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至1934年,全国博物馆、古物陈列所达200余家。据不完全统计,1930-1937年期间,新创刊的文博类期刊有10余种。主要有: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于1930年,1945年停刊,共计出版7卷23期22册,由中国营造学社编辑兼发行,汇集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工作情况。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出版周期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30-1931年为第一阶段,不定期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共5册,研究范围侧重古籍整理和外籍之译述;1932-1937年为第二阶段,季刊,出版第三卷至第六卷,共15册,研究范围侧重实地与文献互证相结合的测绘调查;1944-1945年为第三阶段,每年只出版一册,出版第七卷的第一、二期共2册,研究范围主要是四川、云南地区汉代石阙、崖墓、唐宋砖塔及少数木结构建筑、民居等的调查。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自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共出141期,期间曾数次更改刊名。第1-28期名为《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2年11月出版第29期时改称为《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画报》,至第49期改为《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从1935年10月第80期起改称《河北博物院画刊》。该刊于抗战爆发后不久停刊。博物院及办刊者力事灌输“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需要之知识,罔不力事灌输,并竭力征求中外古今学者之著作,广为发表,以之为社会与文化沟通之枢纽”^[1]。刊发内容门类齐全,知识面涵盖广泛,涉及动植物、化石、民俗、文物、字画、古文字、野外调查和古建筑介绍等方面。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6月

创刊,至1935年6月,共出版4期。内容涉及西湖博物馆发展史、动植物化石、文物研究和考古调查报告等。

《金石书画》^[2]:创刊于1934年9月,为《东南日报》副刊。初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1937年8月,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共出87期。主编余绍宋在发刊词中宣明办刊宗旨:“金石书画之有裨于学术与人生,而为一国文化之表现。夫温故知新,古有明训,吾国苟欲跻于真正文明之域,自非阐扬固有之文化不为功。而欲事阐扬,则必以所固有者广播于大众,使古人精神所寄,渐以浸渍于人心。有所观摩,有所凭藉,庶几足以发其兴趣,油然而敬爱故国之思,而乐于从事,以渐臻夫发扬光大之域,此不易之义也”^[3]。所刊内容为历代金石、书画、印章、书法、竹木雕、书法论著等名人作品,是一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艺术品味的专业刊物。

《考古》:是20世纪30年代各地相关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考古学社”的社刊。创刊于1934年12月,终刊于1937年6月,共出版6期。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主要刊载中国古代文物之研究成果,包括考古著作、古器物照片、拓片等材料,以及古代文学及考释等,还有考古者的履历、自述、考古图片著作目录等资料。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辑出版。1935年9月创刊,至1937年5月共出版2卷10期。该刊“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宗旨”。发表了有关博物馆问题的研究论文和博物馆的工作报告、计划,报道了该会会务及国内外博物馆的情况,并介绍了考古发掘、文物考察等方面的新著。

《古泉学》:是中国古泉学会会刊。1936年6月,由叶恭绰、吴稚晖等人发起创刊,到1937年6月停刊共发行5期。《古泉学》“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贋,辨别时代,启人好尚之

[1] 严智怡:《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发刊词,载《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1期,1931年9月。

[2] 《金石书画》为《东南日报》副刊,因其数量和影响有限,也可将其划为“刊”一类传播媒介。

[3] 余绍宋:《金石书画》发刊词,载《金石书画》第1期,1934年9月。

心为宗旨”。对于创刊目的，杨恺龄在其撰写的《弁言》中写到：“顾古今古泉著作，瑕瑜互见，毫厘千里，审择为难，而珍秘之本，又鲜流传，欲求其考订翔实，抉泉货精英，俾读者奉为主臬者，殊不多观，同人等有鉴于此，爰编订古泉学，其体例以考证（证）典籍，蒐求珍本，研究币制为主，籍谋海内外学者互通声气，并供本会会员发表之机会，以其研究所得，时时公诸世人，际兹草创伊始，简陋在所不免，幸赖阅者之扶持匡正耳。”^[1]

《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7月创刊，1938年3月停刊，共出版15期。主要刊登了有关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及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

《中国考古学报》：1936年《安阳发掘报告》改为《田野考古报告》，出版1册，编辑人员基本是《安阳发掘报告》原班人员。1947年，《田野考古报告》改为《中国考古学报》。至1949年，共出版3册。对于改名原因，李济称：“这本刊物终于能与读者相见，自然是一件可幸的事。编辑部主张把这刊物的名称再改一次：叫着‘考古学报’，并从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就改起，即最近翻印这一期时改为此名，这是很有道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复，在最近的将来是一点希望没有；但考古组的工作却不能不继续。田野工作人员彼此在屋内读读书，除写作未完成的报告外，再多写点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许对考古学可以有更新的贡献。这却并不是说‘考古学报’将没有田野考古报告的文章，只是说，田野考古报告将来只能成为这刊物的一部分稿子，也许是大部分的稿子，那要看看环境与发展了。”^[2]

（三）衰落（1937—1949年）

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破坏，物价不稳，交通瘫痪，中国文博类期刊的编辑、印刷和发

行等环节均受到严峻挑战。除个别期刊得以保全外，大部分被迫停刊，甚至销声匿迹。

但此时的文博类期刊并未完全进入回落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一些期刊还是陆续创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丁守和称：“抗战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实际上获得了空前进展。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在战争的洗礼中获得了新生，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余绪，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八年中，仅中文期刊就有六千种之多。”^[3]这从文博类期刊发展的形势上也得到了印证。1940—1947年，主要有5种文博类期刊创刊并有一定的发展。分别是：

《泉币》：由中国泉币学社创办，双月刊。自1940年7月创刊至1945年9月停刊，共出版32期。创办人张炯伯在发刊词中称：“晚近研究泉币学者不乏人，颇具科学知识者，苦於未覩实物真品，参考无资，落於空谈。富有实地经验者，苦於未受科学洗礼，研求有志，不得其门。斯学之未能发扬光大，未始非两者隔阂，为阶之厉。本志期尽沟通之责，効撮合之劳，庶几融海内泉家学者於一炉，收相得益彰之效，詎不快哉。至提携后进，诱掖初学，本志之刊，尤不容缓焉。”^[4]以此为宗旨，刊物集中反映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钱币研究的成果和状况，收录了大量的资料图片，是泉币研究与收藏的珍贵参考资料。

《江西文物》：是“专研究江西文化经济并注重地方文献”的刊物，由江西文物社编辑发行，1942年创刊，共发行2卷9期。刊物“以研究赣省之文化经济为帜志，尤注意征考地方文献，一面欲自课研究之成绩，而就证于社会，一面藉此为引人参加研究之媒介，而扩充协作互助之热情”^[5]。

[1] 杨恺龄：《古泉学》弁言，载《古泉学》第1册，1936年6月。

[2] 李济：《中国考古学报》前言，载《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1947年。

[3] 丁守和：《抗战时期期刊介绍》“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页。

[4] 张炯伯：《泉币》发刊词，载《泉币》第1期，1940年7月。

[5] 《江西文物》发刊词，《江西文物》第1卷第1期，1942年。

《四川博物馆单刊》：分别于1944年、1948年出版两期。第一期刊发了冯汉骥《永陵》（英文版）一文，为永陵考古发掘工作简报。第二期刊发了冯汉骥《元八思巴蒙文圣旨碑发现记》和韩儒林《成都蒙文圣旨碑考》两篇考证文章。

《文物周刊》：为《中央日报·沪版》副刊，1946年10月创刊，1948年4月停刊，由上海市立博物馆主办，出版了110期。主要介绍文物信息、考古发掘等。

《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创刊于1947年10月，共出版1期。刊载了金毓黻《满文老档考》、傅振伦《苏联博物馆界概况》、阎文儒《罗氏“高昌壁画菁华”的年代商榷》等文章。此外，1946年10月该院古物馆还编辑出版了《历史与考古》专刊，刊载了裴文中《中国之彩陶文化》、阎文儒《西安榆林窟调查报告》、李文儒《吉林市附近之史迹及遗物》等文章。

除了上述重点介绍的刊物外，上海市立博物馆在《民报》上创办了《上海市博物馆周刊》，华西协成大学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华西大学博物馆抽印丛刊》（英文版）等刊物。

二、民国时期文博类学术期刊的时代特点

文博类期刊是推进文物、博物馆学研究，加强博物馆间的联络与合作，促进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它是文博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的发展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博类期刊与文博事业相并行

文博事业的发展决定了文博类期刊的发展，文博类期刊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文博事业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博事业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据统计，全国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28年仅13家，至1934年达250余家。与此相应，文博类期刊也纷纷创刊。据统计，1926-1929年创刊5种，1930-1936年创刊9种，1937-1949年创刊7种。文博类期刊的出现，为学者们提

供了及时公布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提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园地，在传播、普及文物、博物馆和考古知识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推动了文博事业的发展。

（二）出版周期、出版地不稳定，持续时间短

因时局不稳定，这一时期的文博类学术期刊大部分都很短命，往往出版两三期即告停刊。如李济在《中国考古报告》中所称，“出了一期，抗战就开始了”，第二期的稿件“在抗战的第三年就集成了；所有写作人，都是田野工作人。但在二十九年（1940年）夏天付印的时候，他们大半都已星散，战事的演变，终于使这部难得付印而不能按期出版；直到了敌人投降一年以后，承印人才把打的纸版清出来。纸版居然没毁，实给予编辑人一种望外的喜悦。”^[1]此外，因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停刊的还有《故宫周刊》、《故宫旬刊》、《中国考古学报》、《古泉学》、《金石书画》、《考古》、《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河南博物馆馆刊》、《西湖博物馆馆刊》和《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等。

还有一些在甲地创办，但因战争被迫迁徙乙地重新续编。如《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于北京，后因时局恶化被迫停刊。1944年该刊在四川李庄复刊。该刊编者在《复刊词》中称：“第六卷第四期出版的时候，正值七七抗战爆发，此后本社南迁到长沙，到昆明，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庄。虽然在建筑调查研究及服务方面，我们都极力不使中辍，但本社刊物则因印刷方面的困难无法解决，停顿至今已满七年了”。“为急于见到我们所调查的记录及报告，本社社友们曾多次建议我们恢复刊物。但因已往我们这种工作，最重照片及测绘，图之清晰印刷，需用极精良之铜版锌版甚多，故在抗战后方未能努力做到。直到今年（1944年）我们经再三踌躇考虑之后，始决定改弦更张，暂时因陋就简，降低印刷标准，改用石印。我们将插图直接绘版，而不用照片，只希望这简单注解，仍能将建筑结构之大概印象，略示梗概。原物艺术方面仅能

[1] 李济：《中国考古学报》前言，载《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2册，1947年。

努力在可能范围内表现一二，更精审之图录只有俟诸将来”。^[1]

此外，因文博类期刊为纯学术性质，难以吸引私人和企业赞助，多由知识分子自筹资金创办维持，并且因受众面相对较窄，难以靠发行维持，一旦出现资金短缺，就不得不面临停刊的命运。

（三）办刊者具有鲜明的救国意识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想主题中，文博类期刊的办刊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爱国救亡的感情色彩。有的期刊以“科学救国”为旗帜，努力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以普及科学为己任。如《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在其创刊词中明确提出了办刊目的之一是“保文物以存国性”，认为“与夫国性之所寄，而思所以护持光大，生其爱国爱种之心，是皆在博物馆之搜罗设备考订说明。有以启迪而振作之。”^[2]

《江西文物》发刊词中也称：“三四十年前，倭人即锐意研究我国势，几乎无孔不入，专著不下千种，期刊名目甚繁，其处心积虑，可恨亦复可惊也！西洋人之游历我国者，或著专书，或选游记，出版后，其国人争相购阅，我国近代考古学上之重大发现，首推敦煌石室，亦西洋人为之先导，诚我国民心之耻！然外国人之研究精神，不亦大可效法乎？……窃谓抗战建国之大时代中，有识之士，工作不外两途：即实行与研究，各自埋头苦干，同足报效国家，且文化经济，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之两巨轮，就此二者勤加研究，尤于建国有益。”^[3]其中饱含着炽热的爱国之情。

（四）刊物质量高，学术影响力大

这一时期创办的文博类学术期刊，选择论文严格，注重学术质量。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汇集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工作情况，代表了当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铃、梁思

成、刘敦桢、阙铎、梁启雄和单士元等人先后调查了15个省220多个县的历史遗构，测绘、调查和摄影了2000多个建筑，基本上掌握了自魏晋到明清时期的建筑实物资料；在文献典籍整理方面，他们对浩瀚的古籍进行考辨源流，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这些成果全面反映在7卷23期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资料，极其珍贵。

对于稿件质量，《泉币》有着严格的要求。张炯伯在发刊词中写到：“他山攻错，收切磋琢磨之效。体例翻新，免著滥阅厌之诮。不同人云亦云，务期精益求精。……研究学术，新旧门户之见，坚白异同之辨，势所难免。辨难驳诘，藉求真理，事所应有。讥刺攻讦，意气用事，旁敲侧击，离平本题，作无谓之论争，失学者之风度，本志无取焉，此类投稿，恕不录登。平则致和，激则召争，编辑同人，应一本和平为宗旨，不作过激之言论。凡创一议，立一说，必本诸货币原理，史志依据，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力避穿凿，不尚空谈”。张炯伯还对稿件引文做了严格要求：“经传诸子史汉历代食货志，凡关于泉币纪载，见诸通典、通志、通考、图书集成，及诸家谱录者，大抵辗转传钞，……耳熟能详，不容再落窠臼。欲求新知创解，真确资料。……近时研究学问，注重实地调查，如王茂荫之对咸丰宝钞官票，曾上条陈，先后十四条，《东华录》《清史稿》均所不载。有王璜君者，亲至皖省王氏故乡，访其后人，询其究竟，是项条陈，原原本本，钞录一通，登在光明杂志。此种孜孜为学精神，最堪钦敬，尤可效法”。^[4]

《金石书画》主编余绍宋为表示办刊严谨，定下了刊例。诸如：习见之金石，寻常之书画，不录；有关于书画之著录，非稿本或有刊本流传而甚多者，不录等，凡计十条。以保证每期的高质量发

[1]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词，第7卷第1期，1944年。

[2]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第1年第1册，1926年10月。

[3] 《江西文物》发刊词，第1卷第1期，1942年。

[4] 张炯伯：《泉币》发刊词，载《泉币》第1期，1940年7月。

行。如多期连载的宋拓汉碑《西狭颂》、赵孟頫正书《道德经》和王翬仿古六段横幅巨卷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精品。

（五）关注国外学术发展动态

受民主和科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宣传国内学者科研成果的同时，办刊者还密切关注西方的学术发展动态，向国人介绍国外文博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连续3期翻译刊发了日本近代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考古学通论》，介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还专设《考古译丛》一栏，刊载了《有史时代以前之人类》、《有史时代以前之印度》、《墨西哥之金字塔》、《罗马城中发现埃及之方尖石塔》、《莫斯科附近发现史前时代之脑部》、《目视者口中埃及吉扎之发现》、《马之木乃伊在萨喀拉金字塔附近发现》等文章，介绍了国外考古最新发现及成果。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非常重视与国外同领域的交流，翻译引介了国外汉学家在建筑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多篇，如《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叶慈博士据永乐大典本法式图样与仿宋刊本互校记》、《伊东忠太博士讲演支那之建筑》、美国亚东社会月刊《建筑中国宫殿之则例》、《法人德密那维尔氏评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乾隆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状况》、《法人评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英人中国建筑》等，几乎全是当时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日本的学术交流也很密切，《营造辞汇纂辑方式之先例》一文主要是对日本编辑出版建筑方面的辞汇、辞书进行研究并加以介绍。同时，中国营造学社也将该社的新动态、学术成果等译为英文，例如《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等都有英文翻译。可见，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不只限于国内交流，而是放眼国际，希望在世界范围内与同行交流。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刊登了国外博物馆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如赵儒珍译《现代博物馆之形式与功用》、《纽约科学工艺博物馆概况》和《记坎拿大国立博物馆》，傅振伦译《苏维埃联邦博物馆概况》，李永增译《博物馆的理想建筑法》，陈宗静译《保存古物之方法》等；同时还设《博物馆

界》一栏，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最新发展状况。

（六）地域相对集中

从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出版地区分布图可以看出，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杭州、沈阳等地。上海、北京高居其首，占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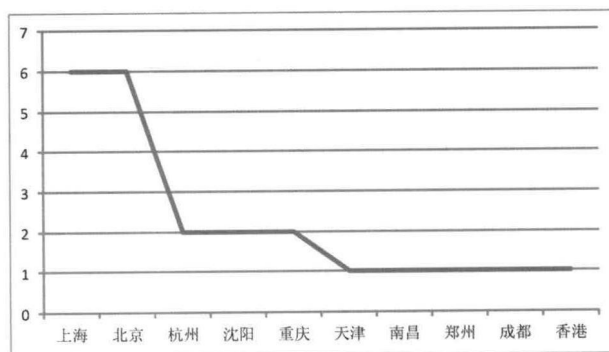


图2 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出版地区分布图

上海得近代文明之先声而兴起新学之风，成为民间社团最为活跃的地区。民国时期共有6种文博类期刊在上海创办，其中有2种由民间社团创办，分别是中国泉币学社主办的《中国泉币学社》和中国古泉学会主办的《古泉学》。这两种期刊也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专门器物类刊物。北京经元明清三朝定都以来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民国时期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此期共有6种期刊创刊于北京。杭州、沈阳等地成为文博类期刊的重要创办地，也与其经济、文化发展密不可分。

结语

从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创刊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受国内外环境影响，中国的文博类期刊先后出现了20多种，但因时局动荡，大多都存续时间不长，有的几易刊名和压缩刊次，由月刊变为双月刊，再变为季刊、半年刊、年刊，但还是难以为继，甚至只出版1期便夭折。可以说，民国时期文博类期刊的兴衰起伏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紧密相联。这些历史刊物至今依然是中国近代文博事业发展历程的见证，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